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需要解决的 几个难点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在财政部学习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报告会上讲话时说,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综合性地解决国有企业深层次体制问题,并突出抓好四个环节。

1.继续推进政企分开。一是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职能,不再直接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二是政府作为所有者,必须通过一套制度安排使所有者代表进入企业,而且行使权能到位;三是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创造条件为企业摆脱“办社会”之苦。

2.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为保证国家所有者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资产不断流动、重组,提高国有资产运作效率,需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和监督体制。其一,国家所有者职能到位,对经营性国有资本必须确定唯一的、排他的国有出资人机构,落实国有资本的管理、运营和监督职责;其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本经营管理职能分开,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其三,确立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实现国家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使企业可以以独立法人身份进入市场,投身竞争,优胜劣汰。

3.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实现政企分开、转换机制,形成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便于筹集资金、分散风险,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投身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竞争的有效的企业制度。

4.面向市场转换经营机制。其一是建立优胜劣汰机制。目前国有企业的困难是国有资本长期不能流动、企业有生无死,使问题长期积累造成的。因此,国有资本应当不断地向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流动,向大型高效企业流动。这样企业有兴有衰、有生有死,但国有经济却可保持持久活力、国有资本从总体上能保值增值。其二是建立人员流动机制。职工与企业应按《劳动法》建立新型劳动关系。做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则根据劳动力市场平均价格和企业效益能增能减。企业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决定用人数量和劳动力结构;职工能根据自身特长、爱好选择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企业和岗位。其三是建立企业管理、技术创新机制。企业必须彻底抛弃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投入、轻产出的粗放经营方式,争取最高经济效益,形成跟踪市场、持续推进管理、技术创新机制。最后是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不再承担连带责任。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可以形成市场对企业的刚性约束。

政企不分 企业只能红火三两年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如果在政企分开方面不进行大胆的探索,好的国企也只能红火三两年而已。(1)因为厂长能干而搞得好的企业,成绩出来后,马上就被调去当官了;(2)投资主体不承担投资风险,但当企业搞好后,领导雄心壮志就来了,到处建设,铺摊子,借银行的钱,致使企业背上大包袱;(3)上级机关在企业搞好后下任务,让企业去兼并、帮助差的企

业,结果可能兼并下好多包袱,最后把一个好企业拖垮了;(4)对于好的企业,上级加任务,我出国你出钱、我买车你出钱,我吃饭你付款等,造成企业职工心理不平衡,干劲没了;(5)共患难容易共安乐难,互相指责、揭发,致使工作组进来查来查去。

(摘自《经济与信息》1999年第11期)

我国中小企业内部 机制有待建立与完善

经济学家魏杰认为,我国的中小企业要发展必须进行产权改革,主要包括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可交易性以及产权设置必须有利于调动人力资本的积极性。

首先,产权必须清晰。中小企业中,国有企业产权法律上清晰,体制上不清晰。国有资产实际上有四大利益主体:全体人民、所有者代表——国务院、厂长经理、国有企业职工——部分所有者。国企的产权不清晰,导致了1996年以来国有资产的全面亏损。现在,一些国有企业实现了部分非国有化,部分非国有资产的产权利益约束力很强,可以带动企业盈利,因而国有资产也能达到增值的目的。

其次,产权结构应该多元化。国有企业一元化产权会导致行政干预,民营企业一元化产权会导致非经济的家庭血缘干预。中小企业只有实现产权多元化,才能保持充分的竞争性,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

第三,产权应保持可交易性。产权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保证具有比较利益的战略投资者进入中小企业。为此,必须实现资产证券化和建立完善

的资本市场。资产实现了证券化才能进行分割,保证交易;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立了,中小企业才能拥有一个产权流动的 necessary 市场。

第四,产权设置必须调动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的积极性。应该考虑将企业家的管理才能和技术创新者的技术才能作为要素参与分配。否则,很难保证企业家廉洁、敬业,很难避免企业的人才流失。

(摘自 1999 年 11 月 17 日《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经济 未来 20 年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课题组通过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制度变革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和判断,认为,如果在未来 20 年,国内政治稳定,国际政治关系不出现大的动荡(不发生大的战争),则中国经济在下个 10 年(2000—2010 年)将以较高速度增长,GDP 增长平均每年 6.4%;再下个 10 年(2010—2020 年)经济将是中速增长,GDP 增长平均每年 4%。

课题组认为,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体制的变革,外资的流入,后发优势,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互促进作用,环境保护的要求等。这些因素的作用力在未来不同时期是变化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市场化的逐渐完成,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将逐渐降低。外资流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资成本的增加,其相对量(同 GDP 相比)将逐渐下降。后发优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环境保护的要求随着中国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这四个原因,加上储蓄率、投资率与增长率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向中速、中低速。

该课题指出,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若保持目前的计划生育控制力度,中国到 2010 年人口将达到 13.8 亿,2020 年将达到 14.5 亿。课题报告认为:较快的人口增长将导致较慢的收入水平增长。因此,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该课题认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应加大利用外资的深度和力度;应把技术引进作为我国技术政策的核心;应促进区域之间要素的流动,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摘自 1999 年 11 月 23 日《经济参考报》)

通过财政贴息方式 启动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刺激经济,关键在需求。扩大内需仍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目前,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传统政策方式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同时,还需要探索新的思路。因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淮提出,可供选择的重要政策之一是通过财政贴息方式启动重要基础产业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用此方式鼓励固定资产更新的政策可以在财政投入与民间投资之间建立直接的连带关系,真正使财政政策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年息 5% 的贴息率计算,500 亿元的财政投入可以直接启动 1 万亿元的投资规模。

财政贴息的资金来源仍可采用增发国债方式。考虑到固定资产更新的节奏和信贷资金的可供量,建议 1999 年增发的国债,半数用于当年的贴息,其余部分仍可适当扩张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建议 2000 年和 2001 年,这一政策继续实行。当前,有些学者对依靠增发国债来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持质疑态度,主要担心财政的未来偿债风险和对中长期财政平衡的冲击。实际上,固定资产更新的财政贴息政策与一般基础设施投入相比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这一政策将在迅速启动经济的基础上带来的税源增加,因而是一项与未来财政增收联系十分紧密的政策。从中长期看,有利于改善财政平衡状况,是一项比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的财政适时退出的政策。

财政贴息的信贷资金并非需要全部来自银行。目前我国已经有“可转换债券”的实践尝试。1999 年,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融资方式有可能使这一方式形成较大规模扩张态势。从资本市场的情况看,信誉良好的大型企业债券仍受到广泛欢迎,也仍有较大扩张余地。此外,由于银行对货币供给的“乘数”作用,固定资产贷款规模扩大过程,实际上还会同时形成存款规模的扩大过程、货币供给的增加过程。如果将这一政策延续为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在债权“打包”上市过程中,银行通过储蓄存款不断从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和贷款资金的反复回收,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货币供给。与此同时,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也同时为财政政策的退出创造现实条件。在 1998 年确保 8% 增长率的政策实施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有弱化趋势。财政贴息政策实际上可以为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再次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一个新的广阔舞台。

(摘自 1999 年 11 月 23 日《经济日报》)